

全  
中国戏剧出版社  
书

A full-length portrait of a man in a military uniform, standing with hands clasped. The man is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jacket with epaulettes and breeches. He is standing on a small wooden platform.



ZHONGGUOLISHI  
BIDUZHISHIQUANSHU



一支歌悠遠淅瀟隨流水  
一部歷史榮辱悲歌現古今



#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蔡 磊 编著

(三十二)

中国戏剧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I. 中… II. 蔡… III. 中国 - 历史 - 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7 号

---

##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73.25

字 数: 37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定 价: 952.00 元 (全 33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目 录

## 第十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卷

### 中国现当代历史概况

|                         |        |
|-------------------------|--------|
| 文化批判 .....              | (4063) |
| 文化大革命 .....             | (4067) |
| 文革的全面发动 .....           | (4067) |
| 全国大动乱 .....             | (4074) |
|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        | (4080) |
|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        | (4087) |
| 艰难中的外交工作 .....          | (4097) |
| 动乱中的经济和文化 .....         | (4103) |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     | (4107) |
|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         | (4108) |
| 伟大的转折 .....             | (4113) |
|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         | (4124) |
| 外交工作的新格局和统一大业的新进展 ..... | (4151) |
| 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突破 .....        | (4159) |

### 中国现当代历史纪事

|                      |        |
|----------------------|--------|
| “一边倒”外交方针 .....      | (4170) |
| 巩固政权,“三套锣鼓一起敲” ..... | (4173) |
| “边打、边稳、边建” .....     | (4178) |

|                   |        |
|-------------------|--------|
| 过渡时期总路线 .....     | (4182) |
| 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 | (4184) |
| 社会主义改造 .....      | (4187)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4191) |

## 文化批判

### 重提阶级斗争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包产到户问题在内。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这个题目也就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当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会议期间,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得到毛泽东同意,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

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会后还撤销了由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验再一次被压下去。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工作就此结束。为被划作“右派分子”的人甄别的提议和试点,也被指责为“猖狂之至”给打回去了。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的重新提出,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

理论准备。全会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形势分析,同时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本来应该继续进行的纠“左”工作,刘少奇提议将这次全会批判彭、习、邓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高级干部,不向下传达。中央接受了这一提议。

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关于商业工作等几个决定以及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修正草案,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这样,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 and 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矛盾暂时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

## 四清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的同时,从1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在全国部分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两次讨论社教运动的会议,制定了“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开始了社教运动的试点。

第二阶段,从1964年5月到年底。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部分县社大规模开展的阶段,中央通过了《后十条》修正草案。

第三阶段,从1965年1月至1966年上半年。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展开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到1966春,全国大约有三

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四清”，国营工业和交通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九，其他如财贸、文教等部门只在少数单位试点。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缺点不足，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运动中却存在严重的错误。运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使大批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只是由于当时全国主要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所以“四清”运动还没有形成全局性的错误。

## 理论界的冤案

1964年7月，文艺界开始第二次整风运动，运动中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文艺界人士进行错误批判，并且改组了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的领导班子。在文艺界整风的同时，在全国报刊上对一大批文艺作品进行公开批判。

从1964年夏开始，对文艺界的批判进一步扩大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在社会学界，批判了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首先提出控制人口的建议。马寅初认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长太快”，“一定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无疑是正确的，对其错误批判，造成人口失控。

在哲学界，批判了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他曾在讲课时说过，“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全国报刊载文进行批判，最后将其定为反党分子并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此外，哲学家冯定、冯友兰等也受到错误批判。

在经济学界，批判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他从五十年代后期就揭露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弊端，主张按经济规律、价值法规、经济方法等管理经济，反对不讲经济效益，只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1964年后，他被加上反对政治挂帅、否定阶级斗争、利润挂帅、修

正主义的罪名在全国进行批判。

在历史学界,批判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他主张“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还提出让步政策的见解,来说明古代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让步。同时受批判的还有明史专家吴晗、历史学家周谷城等一大批史学工作者。

到1966年初,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批判运动再次波及到了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

上述这些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 对教育领域的错误判断

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农村的“四清”运动。这个通知对教育领域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我国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不是在无产阶级手里,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这种估计,给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时,把参加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1964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队由五人小组领导,即张磐石(中宣部副部长)、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工作队成员包括从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文教部门及高等学校抽调的干部二百五十余人。由此开始,到1965年8月,全国共有一百四十八所高等学校的数十万名师生参加“四清”运动。全国各地各级党政机关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帮助开展运动。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高等学校社教运动出现了严重问题,有些工作队轻率地认为学校党委烂掉了,变质了。于是采取过“左”的做法,或进行夺权斗争,展开猛烈的大字报攻势,召开大大小小

各种会议,使学校气氛异常紧张,造成严重后果。

中学的社教试点由于工作队本身就分不清什么是学校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问题较多的学校看成是夺权单位,采取了扩大打击面的夺权斗争的做法。导致教师精神压力大,学生狂热情绪日趋按捺不住。在高等教育部召开的直属高等学校(扩大)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上有人说,大学里的教研室只有三分之一是我们掌权,三分之一是我们在起一定作用,三分之一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里。有人则认为:没有几个教研室是由我们的人真正当权的。还有的说:某系领导权实际操在资产阶级专家手里。某地一个反映阶级斗争问题的调查报告,把教师中各种大小缺点错误如教师忙家务、对人一团和气、工作不深入、学生学习不努力、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遵守公共秩序、上自习课不守纪律、男女同学不敢接近、占小便宜等等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把大多数师生都看成阶级斗争的对象,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少地方撤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的学校行政和社会工作职务。有的市教育局宣布:凡地富家庭出身的教师,一律不许当班主任;有的县委决定,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教师一律清洗。

在学校,社教运动中,缺乏社会经验和政治阅历,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被阶级斗争的“左倾”偏激理论鼓动起来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时充当狂飙呼啸的潮头。

因此,学校、社教运动与理论领域和文化界的大批判一起,汇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 文化大革命

### 文革的全面发动

#### 文革序幕的拉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文章。

1959年毛泽东针对一些同志不敢讲真话和实话,提倡要宣传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受文艺界和胡乔木之托,很快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后来,又写了《海瑞罢官》。

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以及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采取的调整措施等问题上的认识分歧有所发展。在此背景下,江青、康生和姚文元等别有用心的挑动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于是,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毛泽东批准,发表在《文汇报》上。文章点名批判吴晗,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与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专横地将《海瑞罢官》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1965年11月29日,北京和全国其它报纸开始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彭真为组长的“文革”五人小组和中宣部力图把这场批判限制在“非政治问题”的学术批判范围内。《人民日报》11月30日转载时加了经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田家英、胡绳、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逐步升级,调子越来越高,并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各领域,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反对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毛泽东指责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批判《海瑞罢官》,并表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这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迅速发展到了对《二月提纲》、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以至进一步发展到“炮打司令部”。批判《海瑞罢官》,是以文艺为突破口,以“三面红旗”和1962年以来党内意见分歧为政治内容,针对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作为全局性问题而提出来的。这一批判成为一场大斗争的导火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前定下的。会议完全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彭真的所谓“错误”,是向党中央提出了《汇报提纲》,并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罗瑞卿的所谓“错误”,实际上是指反对林彪搞个人崇拜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陆定一的所谓“错误”,是批评过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一套方法,以及反对林彪等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杨尚昆的所谓“错误”,是在毛泽东身边“私设窃听器”。会议以莫须有的罪名,毫无根据地说他们四人组成一个“反党集团”。因此,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并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们的“问题”。

这一切说明,这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导思想是错误的,完全从“左”的和个人崇拜的观点出发,把正确说成错误,严重地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也说明当时中央内部的政治生活已不正常。

会议在5月16日,通过了由毛泽东在外地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前言,前言严厉指责彭真向党中央提出《汇报提纲》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并宣布撤销《汇报提纲》和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下。二是列举《汇报提纲》的所谓十条罪状,逐条批驳,把《汇报提纲》中提出的一系列正确观点,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时还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三是结束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汇报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从整体上看,《通知》对当时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

的估计,是集中代表“左”倾方针的文件。

## “文革小组”产生

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中央文革小组应运而生。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陈伯达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其成员也包括一些老干部和工作人员,但很快就被陈伯达、江青一伙排挤出去。

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即为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一伙所把持。1967年8月以后,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都先后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只剩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在江青等人的控制下,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篡党夺权的重要阵地。他们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大肆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冤假错案,破坏生产,夺取党政军权力等。对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起了极坏的作用。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而建立的,它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中央文革小组经常单独发号施令,1967年1月开始,多次与中共中央或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布贺电、命令、决定、通知等文件,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1967年批判“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变成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指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机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

## 《十六条》的发布

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同时,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个决定是陈伯达、康生等于7月初起草的,经

毛泽东修改定稿。所以称为《十六条》，是因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罗列了十六项内容和规定。

《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对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运动依靠的对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运动的方针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运动的形式是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批判。领导运动的权力机关是“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十六条》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方法和领导等作了错误的规定，从而造成了全局性的错误。

《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和《十六条》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 批判“三家村”

1961年夏，邓拓约请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他们发表的文章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针对当时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讽刺。于是，1966年5月8日，被江青御用写作班子定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调，并指责有人包庇“三家村”，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载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红旗》杂志上，刊登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时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

不久，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邓拓、吴晗含冤而死。林彪、江青一伙还在各省、市、自治区大抓“三家村”、“四家店”，使“三家村”冤案祸延全国，许多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和迫害。

### 炮打司令部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曹轶欧指使下，北大聂元梓等7人贴

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攻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等“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破坏文化革命”。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北京大学多数师生员工的反对,也受到周恩来、李雪峰的批评。康生却背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将这张大字报抄送给毛泽东。毛泽东6月1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大字报的全文。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同时配发关锋、王力、曹轶欧等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诬蔑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这张大字报发表后,北京大学和首都许多高等院校陷入一片混乱,对全国也产生巨大影响。

紧接着,在8月5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毛泽东的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它不仅明显地针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而且明确指出党中央内部有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标志着对党中央状况估计错误、阶级斗争“左”倾理论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分野。以这张大字报在全会的发表为开端,“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小组会上不仅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了发挥,而且乘机猖狂攻击刘少奇。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全会的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表示拥护,没有紧跟。这与许多人对这张大字报不理解有关,也与这张大字报的打击面相当大、

许多人搞不通有关。

## 红卫兵运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形势急剧变化,红卫兵迅速发展起来。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几个学生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以及北京市二十五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样,由中学生首先自由组合的秘密组织“红卫兵”就作为一种集团力量,开始步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舞台。

红卫兵组织成立之时,正值工作组进驻各校,红卫兵组织便迅速同工作组发生了冲突。面对工作组的压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先后于6月24日、7月4日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张大字报,并将这两张大字报抄寄给了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这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很快传遍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

1966年8月19日开始,红卫兵在北京兴起大破“四旧”运动,并迅即影响全国。8月20日以后,各地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和传单,集会演说,向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展开猛烈冲击,在此之前,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下旬,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各地红卫兵走出校门,纷纷上街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发通令、倡议书,更改地名、店名、校名,强制改变群众的衣着、发型。

在破“四旧”狂潮中,各地红卫兵还掀起揪斗“牛鬼蛇神”,抄家、打人、冲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领袖的浪潮。

各民主党派机关被迫停止办公,报请中共中央审查。

不加鉴别地砸毁文物,烧毁字画破坏名胜古迹,也是破“四旧”的重要活动之一。结果“文革”期间,民族悠久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使文化事业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是,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对于红卫兵的“革命行为”予以充分肯定,并要求工农兵给予“坚决支持”。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通过电台、报纸报道后,北京大学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随即便出现了少数外地红卫兵为了解首都形势、学习北京大学经验而来到北京。基于迅速冲破各地党政机构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使全国的运动连成一片的考虑,毛泽东在6月10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以后,毛泽东先后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以推动和发展“文化大革命”。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通知发出后,大串连在全国出现了高潮。大批北京学生也到全国各地串连、“点火”,建立“联络站”,冲击机关,揪斗干部。各地工人也参加了串连。全国停学、停产串连的人数以千万计,给交通运输造成沉重负担。红卫兵运动仍然方兴未艾,甚至愈演愈烈。

随着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从此便揭开了全国性大混乱的序幕。

## 全国大动乱

### “夺权”风暴

1966年10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